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 · 李妙根編 朱維鈺校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中國革命博物館
 3
 8183
 16750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清)劉師培著. -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6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錢鍾書主編)

ISBN 7-108-01153-0

I. 劉… II. 劉… III. 劉師培-文集 IV. Z4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8) 第 16017 號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著者	劉師培
責任編輯	潘振平
封扉設計	寧成春
版式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
郵編	一〇〇〇一〇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開本	六三五×九六〇毫米 十六開
印數	三千册
字數	三十七萬八千字
定價	四十九元 印張三十五·二五

編者說明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的晚清編，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

遴選的學者和論著，着眼於學說有新意，有己見，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結集則不拘一格，以專題為主，每種或收一人一書，或輯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

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選擇底本，取原校較精的刊本；異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覆核引文，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重施標點，包括分段；編製索引，分人名、書名兩類。

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附於篇前。導言既重可讀性，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也重學術性，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為行文簡明，諸導言凡引證出處、攷訂史實或商榷

疑義，均以附注形式陳述。

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晚清編擬分輯刊行，初定每輯十種，先成先印。如可按設想出齊，當能略見系統性。

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鈺組織實施。

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由於種種緣故，長期不克面世。現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

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同時期待高明指正。

編例

一、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底本。以原刊為主，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誤，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一般不作理校。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於正文不作改動。

節錄。於篇題下注明，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

標點。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概施以新式標點。

分段。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讀者。

注釋。作者原注概從原刊。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以頂注出之。

譯名。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謬誤，則由編者逕予改正。為方便閱讀，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

版式。概用繁體字，直排式。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均改為通行繁體字。原作或有雙行夾注，現均改為單行夾注。

索引。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書名兩種索引，以便通檢。

二、本叢書所選諸種，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予以保留，並移作附錄。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導言

朱維鈞

壹

誰曾留心清末民初的政治史學術史，誰就不會不注意劉師培。

確實的，此人的一生很短，死時才三十六歲，現身於思想文化界的時間更短，不過十六七年，却無論在學林，或者在政壇，都留下了一串腳印。而且，略窺那串腳印，便會發現，屬於純學術的一行，特色是「不變」，而屬於藉學論政的另一行，特色則是「善變」，並且是倒行式的變化。二者的反差如此分明，令人不禁以為此人的兩足，踵尖位置似乎生來是互倒的，因而在各走各的路。

譬喻終究是譬喻。事實上，以往海內外關於劉師培的研究，更多注意的是他藉學論政的一面，在政治上善變的一面。〔一〕存在着「以人廢言」的取向，這在海內有關討論中尤為明顯。〔二〕但由歷史所昭示，劉師培的短暫一生，是奇特的。學界的巨子，政壇的浪子，既得聰明益，又被聰明誤，況且還有位行爲同樣奇特的妻子，如此錯綜的矛盾集於一身的人物，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史上，雖然不算絕無僅有，却可說是那個時代某一類型的學者化身。

不待說，這樣的人物，值得研究，也應該研究。劉師培生前曾自編《左盦文集》，僅五卷，而且不收辛亥革命前的激烈論政的文字，既太簡，又片面。他身後蕭條，遺著散落。經錢玄同多年搜集，於一九三六年即劉師培去世後十七年，編成《劉申叔先生遺書》，輯存他的已刊未刊的論著凡七十四種。劉師培的大部份著作，賴以保存。但這部《遺書》，既有遺漏，還有隱諱。譬如劉師培在晚清所辦的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天義報》及其後身《衡報》，內有多篇文章，在《遺書》中便被刊落。據初步統計，《遺書》未收的劉師培詩文，約有一百多篇。〔三〕

研究需要資料。豈止當年發表劉師培論著的報刊，在國內收藏單位都多半視若拱璧，即使五十五年前刊印的《劉申叔先生遺書》，也為讀者所罕覯，儘管當初校勘尚欠精審。目前還缺乏重新輯校出版劉師培「全集」的條件。但作為研究晚清學術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個案，一部較全面地展示劉師培在晚清論學論政概貌的選集，則更適合讀者的需要。

貳

劉師培，字申叔，曾更名光漢，號左盦，一八八四年五月生於江蘇儀徵。〔四〕

儀徵劉氏是晚清有名的經學世家。劉師培的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以三世相續，共注一部《春秋左氏傳》〔五〕，而著稱學林。父貴曾早逝，由母李氏給他啓蒙。他自幼便顯示具有超常智力，經書過目成誦，八歲就能解《周易》變卦法。由於劉氏三代都功名蹭蹬，因而他被父

輩寄予過大的期望，是很自然的。〔六〕

劉師培似乎不負所望。一九〇一年補縣學生員，次年應江南鄉試，便中了第三名舉人。現存清代光緒壬寅科江南鄉試檔案，記錄他那年十八歲，可謂少年得意。但沒料到世道變了。就在一九〇二年，被八國聯軍驅趕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偕同光緒皇帝「回鑾」北京，迫於內外形勢，表示要改行「新政」，首先被提出的便是廢除科舉制度。劉師培敏感到中進士人翰林的清夢，快被打斷了，沮喪之極。這由他兩年後仍哀嘆「飛騰無術儒冠誤」〔七〕，可以作證。

由於家貧，也由於心情沮喪，劉師培在一九〇三年初跟隨友人到了上海，顯然想在「十里夷場」碰碰運氣。豈知不過月餘，他就發表〈留別揚州人士書〉〔八〕，宣佈他決心「排滿」了。

劉師培的政見突變，這是頭一回。正像以後多次突變一樣，驟然從一極跳到另一極，令人很難尋繹他思路的由來。例如這回突變，馮自由以為，乃是他「少讀東華錄，夙具民族思想，尤佩仰章太炎學術」的緣故〔九〕。前說無佐證，後說似有可能。但他佩服章太炎，恐怕不僅由於論學臭味相投，而且由於迅即被章氏的排滿論所折服。

一九〇三年夏季「〈蘇報〉案」發生，章太炎和鄒容，在愛國青年的眼中，成了為革命受難的英雄象徵。他們的行為，怎樣使得劉師培傾倒，由他在這一年發表的三部著作可證。《中國民族志》集中闡述「光復漢族」的見解，《中國民約精義》直接呼號民權自由。兩書都署名「光漢子」。而更直白清廷應作為夷狄攘除的〈攘書〉，索更號為名，署姓名為「劉光漢」。總之，從見解到用名，處處表現以闡發〈序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思想為己任。〔一〇〕誰都

知道，清政府向上海租界當局控告章太炎、鄒容「叛逆」，正是以章太炎的這兩篇名文當作主要罪證。

這三部著作也使虛齡才二十歲的劉師培名聲大噪。尤其是他模擬盧梭，亟論中國需要「天賦權」的《中國民約精義》，更受同代知識青年的歡迎，有人甚至作詩恭維他是「東亞盧騷」【一一】。

一九〇三年冬蔡元培、葉瀚等發起「對俄同志會」，出版《俄事警聞》【一二】。劉師培成爲它的積極成員，撰文揭露沙俄侵吞中國領土的陰謀，藉以抨擊清帝國的內外政策。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和沙俄竟在中國的東北大打出手，《俄事警聞》改組爲《警鐘日報》。劉師培又和林獬等共同擔任主筆【一三】。同年又相繼參加蔡元培等主持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並成爲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組建的光復會的首批成員。【一四】

這期間，劉師培論政論學都相當活躍。在《蘇報》被封禁後，相繼出版的《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中國白話報》，乃至《覺民》等，都刊有劉師培的文章。他的文風也愈來愈肆無忌憚，甚至署名爲「激烈派第一人」【一五】。

叁

然而劉師培也沒有忘情於他的「家學」。當初章太炎與他一見如故，也因為發現儀徵劉氏的這位第四代，經學造詣已堪稱其「家學」的傳人。

本世紀初的上海，真是個魚龍雜居的「海」。講革命的講復古的，講進化論的講特創論的，講孔孟道統的講文化西來的，都能在這裏覓取知音。一九〇四年末出現了「國學保存會」，發起人鄧實、黃節，都來自廣東順德。次年二月開始刊行《國粹學報》，總纂鄧實，而擁戴尚在獄中的章太炎做盟主。【二六】

《國粹學報》的名實並不相符。豈止「國粹」一辭是從日本輸入的【二七】，就是它存在七年間貫串八十二期【二八】的一個基調，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也屬於舶來品，從十九世紀晚期法國漢學家拉庫伯里那裏販來的【一九】。但它揭出宗旨在於「爭科學」，講歷史，使中國文化不致成爲清帝國「種族專制」的陪葬，則對政治取向很不相同的學者名流，都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曾爲它撰稿的知名人士，在半百以上。然而它的主要台柱，却是劉師培。

自《國粹學報》創刊號發表劉師培的《讀左割記》，到它於一九一二年宣佈「滿清退位，漢德中興」而終刊，劉師培論著出現其中者，有八十年，就是說僅有兩期沒出現他的姓名或筆名。【二〇】而論著數量，也多達五十餘種。可以說，他的論學文字，大半見於《國粹學報》。難怪有種誤說，竟以爲此刊是劉師培與鄧實「創辦」的【二一】。

還在一九〇三年七月，劉師培便首倡「黃帝紀年」，既否定君主年號，又否定孔子紀年，而後者正是康、梁保皇主張的一種掩飾。因而很快被「排滿革命」論者普遍接受【二二】。喚醒國民的「黃帝魂」，也從此爲革命者所樂道。

但劉師培又走得太遠了。所謂古巴比倫是世界文明共同發源地的說法，本來就是一種假設，

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更在司馬遷時代便是難題。拉庫伯里揉合假設與傳說，斷言黃帝是古巴比倫一族酋長，率衆東遷到中國，驅逐了原居民苗人，從而成爲華夏族的鼻祖。這在學術上原屬推論，而且很像歐洲白人移民「新大陸」後對付印第安人的故事新編。雖然首先相信的並非劉師培，作文宣傳的也不僅是劉師培。但從《中國民族志》、《攘書》，直到《國粹學報》所刊載的《國土原始論》、《華夏篇》等，引經據典，考證日煩，力證漢族古文明與西方文明同源，則是劉師培的突出之處。

除了論證中國文化西來說，其學術意義頗多可疑外，劉師培在晚清的學術論著，固然時時流露學派的成見，例如論今文古文，則頌古非今，尤其不滿魏源、康有爲的所謂今文經學，例如說漢學宋學，則尊漢抑宋，尤其好斥湯斌、李光地等所謂理學名臣。但相形之下，他的學術成見不比章太炎更多，而遠較他們的共同論敵康有爲遜色。

譬如說《讀左劄記》。劉師培把這組短論供給《國粹學報》創刊號，無疑有炫示「家學」真傳的意向。內容呢？八則劄記，都集矢於「區別夷夏」，非但不像他的先輩那樣，對《左傳》的每事每言，都力求搜索出與公、穀二傳的異點，反而設法證明《春秋》三傳的同點，並說同點就在三傳都是「種族之學」。這是在破門戶，哪是在守家學？

實際上，不但劉師培，而且康有爲、章太炎，都已不是甚麼經學家。在歷史上，經漢學也罷，經宋學也罷，或者今文古文，朱學王學，都屬於中世紀統治學說的某種形態。就這個意義來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清代漢學，以及龔自珍以後的清代公羊學，都已經脫出中世紀經學的常

軌。至於康、章或劉師培，在清末從事的學術活動，更分明是在給中世紀統治學說掘墓。他們自稱是相信董仲舒，還是相信劉歆，並不能改變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實。〔三〕

肆

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鐘日報》被上海有關當局封禁〔二四〕。劉師培不得不避地他去，先歷居浙江平湖，繼赴蕪湖，化名「金少甫」，先後任教於安徽公學、皖江中學等，將近兩年〔二五〕。這期間，他曾參加陳獨秀等發起的岳王會。但除教書外，顯然有更多時間從事讀書寫作，因為這期間他的學術論著最多。

《劉申叔先生遺書》收有多部題作「教科書」的著作，譬如《經學教科書》、《倫理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地理教科書》等，不待說都是為教書而編的講義。教科書需兼顧知識性、系統性，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加以身處秘密狀態必須的審慎，因而這類著作，雖然都顯示作者力求以新式教科書為模式，使結構和內容，都有別於八股式的高頭講章，見解却都比較平和，罕有激烈的議論。同樣，這時期他發表的另一些論著，如《國學發微》、《孔學真論》、《古政原論》、《理學字義通釋》等等，學術氣息較強，但看其陳述形式，也令人感到原是講義。

不過，單看以上名目，便可想見那兩年的劉師培，不論出於主動還是被動，在學術上涉獵的方面多麼寬泛。貫串古今，溝通中西，這樣的嘗試當然使年輕的劉師培獲益匪淺。無怪乎一九〇

五年後，他多次宣佈應做「通儒」，而不顧可能辱及先人，鄙斥道「僅通一經、恪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二六】

這期間劉師培的學術視野，看來較集中的有三方面，即周秦諸子學、清代學術史和古典文論。

諸子學研究，從十八世紀末起，便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對揚州學派的學者，劉師培首先欽佩汪中，便因為汪中是清代漢學的諸子學研究先驅。但到本世紀初，「復興諸子學」，已被賦予新的意義。那就是希望它可能成為在中國開展一場意大利式文藝復興運動的前奏。文藝復興，鄧實稱作「古學復興」【二七】，章太炎稱作「文學復古」【二八】。在《國粹學報》創刊號，劉師培便含蓄地表示，他們很想在中國步當年但丁的後塵【二九】。以光大諸子學來貶斥孔學，至少是《國粹學報》主要成員的共識。但劉師培到底受「家學」的限制，對諸子學沒有甚麼特見。他所做的，主要是儒家諸子的研究，乃至將西漢經學家都列為諸子一類，手法頗似當年康有為；他特別強調「古學出於史官」【三〇】，又是遠眺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近承章太炎的「諸子出於王官」說【三一】。

古典文論研究，是劉師培的得意方面。《國粹學報》創刊起，便不斷刊載他的這類論著。但在理論上，從未跳出阮元「文筆辨」的窠臼。倘說有貢獻的話，那就是他不斷從歷史實例和文字音韻兩個側面，論證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主張的合理性【三一】。另外，就是除「俗文」外，論著大都散發着濃烈的駢儷文氣息，用實踐來表現他對揚州學派另一位先輩的欽佩。在

柯城派仍在文壇有相當影響的當時，劉師培的做法不能說沒有意義，也可以部份解釋他為甚麼愛同嚴復作對。但這使他的論學論政文字，至少在形式上，難讀程度僅次於章太炎，致使他似乎自己也感到有闕欠，必須在文中塞進大量夾注。

關於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或許是劉師培在這幾年成績最佳的領域。固然，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江藩、阮元、方東樹、龔自珍、戴望，下及戊戌維新前後的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章太炎等，都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對清初以來的學術進程，有過片斷的或系統的概括、評說與爭論。這使清理歷史事實變得較為容易，但也使得保持客觀態度變得更加困難。劉師培研究清代學術史，是在章太炎的基礎上起步的，而且在總體上沒有脫出《旭書·清儒》等論著的影響。但他的門戶之見究竟較章太炎淺，而且顯然在考察歷史本身上下過功夫，因而常有別解。

劉師培經常從不同角度論述同一課題。關於清代學術的著作，尤其如此，重複甚多。但從研究方法來說，更換角度倒是必要的。例如他常取的角度有三，所謂「變遷」、「不同」和「得失」【三三】。這表明，他在研究中，不僅注意到歷史的時間差異，而且注意到同時代中學術的空間差異，因此避免對學派或學者作出絕對化的所謂褒貶。將不同角度的觀察結果進行整合，就使他關於清代學術史的若干論著，不論談文學，論漢學，還是評學風，同章太炎相比較，謹嚴稍遜，但意氣較少，頗能打動同代學人。他得以與章太炎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三四】，不是偶然的。